康梁之别——流质与凝质的心理学归因

赵晨阳（2020012363，zhaochen20@outlook.com）

摘要：通过社会心理学、动机心理学与人格心理学相关理论的分析，推知康梁二人产生流质、凝质区别的归因在心理学角度上为既得利益的差异化与恢复、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的渴求程度不同导致不同的心理需求。异化的心理需求加之社会心理等影响，最终导致二人产生不同的选择动机，从而发展为不同的政治选择行为。

关键词：梁启超；康有为；流质；凝质；既得利益；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动机心理学；

纵观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康梁师徒二人皆在老大中国向少年中国的艰难行进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师徒二人在戊戌政变后，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局势与思想浪潮，逐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概括而言，康有为终其一生没能走出他四十岁时的执念，囿于《三世说》、《公羊学》等三十所成学识，抱着虚君共和的执念病逝青岛。而梁启超则自公车上书始登历史舞台，此后政治思想几经变迁，并最终走上了民主立宪的道路，戊戌变法仅为其人生拉开序幕。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后二人的人生轨迹产生如此重大差别？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可以见得康有为本人对自身与梁启超的差别早有认识，并将其归纳于：“汝真一极流之质, 吾一凝质, 望汝后勿再流而已[[1]](#footnote-0)。”

基于康有为的认识，学界已在社会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等角度进行过深入研究。如史飞翔著《康有为梁启超的师生恩怨》[[2]](#footnote-1)与黄跃红,王明德二人著《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3]](#footnote-2)等等。黄跃红,王明德二人进一步指出：所谓“流质”，指具有一定可流动性的液态物质，“常与多变、多欲、机智、随和、无成见等性格特征相联系”[[4]](#footnote-3)。而“凝质”，此处指凝聚的固态物质，“具体表现为执着、强毅、主观、自信、自负、有成见、拘文牵义、不为流俗所动等性格特点[[5]](#footnote-4)。”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心理学与人格心理学角度尚能对“所谓流质与凝质的区别”进一步分析，并以此探讨康梁之别的深层次原因。显然康梁二人流凝之别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特意在此以心理学理论浅析康梁政治思想选择的原因并借此探讨二人的流凝之别。

一、动机心理学：心理需求差异导致动机不同

动机心理学公理认为动机是驱使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原因，并将动机定义为“以一定方式引起并维持人的行为的内部唤醒状态，主要表现为追求某种目标的主观愿望或意向，是人们为追求某种预期目的的自觉意识[[6]](#footnote-5)。”动机源于生理与心理意义上的需要，而后者具体为对成就、权利、自尊、社会赞许以及归属感的需要。然而由于时代环境、所受教育、既得利益等介入，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需求有着显著差异。需求的差异化与不同需求的累积进一步转化为不同的动机，从而在特定生理或社会条件下转化为行动。

基于这些基本概念，从动机心理学理论出发，可以推测出康梁二人政治思想的不同选择在心理层面上源于二者差异巨大的心理需求。梁启超自言，“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7]](#footnote-6)”，从诸多角度，可以推知，梁启超的心理需求本质上是对救亡图存社会成就的渴求。然而从“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8]](#footnote-7)”中可见，由于师从康有为造成的巨大影响的缘故，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的心理需求与康有为早期的心理需求大体相近：通过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改良清廷旧制与中国社会体制，从而以较小的社会变革达到救亡图存的社会成就。然而，在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后，受到国内清廷假意设立咨议院、革命党引发苏报案、师生二人政治理念思想日益冲突、“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9]](#footnote-8)”等因素影响，梁启超逐渐形成建立消灭封建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心理需求。而康有为的心理需求从他流亡海外后进行的广泛保皇宣传，辛亥革命后参与张勋复辟[[10]](#footnote-9)等行动，可以推知为：通过呼吁保皇运动，恢复光绪、溥仪等君主的权利，进而再度进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运动。进一步思考，笔者认为二者形成不同心理需求的一大原因在于二人不同的既得利益的介入。

二、既得利益理论：既得利益心理驱力使然

社会心理学中的既得利益理论指出，“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是一种[利益冲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7%9B%8A%E8%A1%9D%E7%AA%81" \o "利益冲突)，指的是一个人在决策时可能会因为在既有选择下有机会获得利益，而偏好这个选项。“既得利益”不一定是现在就已经有的利益，也可能是若制度不变，该人或群体可以得到的。也即是当结果中包含有人们的既得利益、或有利于恢复、维持与扩大自身的既得利益时，人们更愿意按照自身的态度采取行动[[11]](#footnote-10)。”而所谓自身的态度，“指的是一种行为与认知倾向，它通过对于特定人物、地点和事物进行好坏评价得以体现[[12]](#footnote-11)。”态度可以改变，但绝非易事。没有慎重的反思、强迫或者利益诱因等事物影响，大多数人不会改变他们的信仰或者政治立场，这一观点恰是在康有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基于戊戌政变前后的史料研究，可以明显发觉到康有为的确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一大既得利益者。早年的康有为自幼寒窗苦读，“成童之时, 便有志于圣贤之学[[13]](#footnote-12)”，“开口圣人, 闭口圣人, 以至于大家都称他‘康圣人’[[14]](#footnote-13)。”可惜多次参考，皆不曾考取功名。在游历香港后，他逐渐背离了传统儒学思想。其后康有为上书不达，离京返粤，痛感民智未开，创立万木草堂并亲执教鞭、推动维新。1895年秋，康有为通过公车上书名扬天下，其维新思想终于使康有为获得了一定的既得利益，这在当时具体体现为较高的社会地位：世人名流皆乐意结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戊戌变法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康有为的既得利益，使其在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取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既得利益的扩充转而左右康有为的态度，使其更加坚定于通过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改良清廷旧制与中国社会体制，从而实现前文所论述“救世主”般的理想。由此观之，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的诸多政治活动，譬如筹建保皇会、策划自立军起义，亦或是辛亥革命后支持溥仪复辟，大多有着维护既得利益这一心理需求的身影。由此推知，此时的心理需求也相应异化为：通过君权的恢复，再度进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运动。这无疑有利于恢复康有为的既得利益，甚至可能由于复辟有功，使其既得利益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也是戊戌变法的既得利益者，然而他似乎并未有表现出如同康有为一般对恢复资产阶级维新派既得利益的渴求。这不禁让人怀疑，是否既得梁启超的政治选择是既得利益公理的一大反例。然而，再度深入探究康梁二人个人经历的差异，仍然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戊戌变法带给二人的既得利益存在差异，加之早年经历的不同，使得二者对于维系既得利益的渴求程度有着显著差别。并且，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的个人选择依然在较大程度上维护了自身的既得利益。

这里笔者对康梁二人在戊戌政变中的既得利益进行厘定：康有为的既得利益包含有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两大核心，而梁启超的既得利益主体上为社会地位，其政治地位相较康有为而言明显较低。并且，梁启超少年时便学识有成，“己丑年十七，举于乡[[15]](#footnote-14)”，素有少年举人的美名，并没有康有为早年那般功名难就的苦痛，从而相较梁启超而言，政治地位对于康有为更为来之不易。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更倾向于珍惜付出了相对更大的代价而取得的事物[[16]](#footnote-15)。基于这一观点，政治地位的区别加之二者取得政治地位的难易程度不同，使得二者对维系政治地位这一既得利益的态度产生一定分歧。

从而，对于康有为而言，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无疑是恢复皇权，推动复辟，这样方能同时维系其社会地位与得之不易的政治地位。至此，既得利益的介入促使了康有为恢复皇权、变法维新、虚君共和的心理需求的形成。然而，对梁启超而言，政治地位的维系需求较小，同时无论选择怎样的政治思想，梁启超的主体既得利益——社会地位都可得到维系，甚至由于梁启超犀利的文笔而进一步扩大。梁启超无论是选择继续顺从康有为，坚持维新，还是选择不断改变自身的政治思想，皆可较大程度的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综上所述，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双重既得利益加之对恢复、维系乃至扩大既得利益的高度渴求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辛亥革命后的康有为产生恢复皇权、再度维新的心理需求，进而转化为坚定保皇乃至复辟行为的动机。出于这样的动机，其性格便表现为凝质。总而言之，既得利益与维护既得利益的渴望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康有为凝质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无论选择何种政治思想，梁启超的主体既得利益都将得到维系，并且梁启超对政治地位的渴求大体上低于康有为，因而既得利益因素并未显著影响梁启超的心理需求，其心理需求仍然为救亡图存的社会成就。这一社会成就并没有强烈的路径需求，故而为梁启超奠定了成为流质的基础。

进一步思考，既得利益带来的心理动机仅仅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政治思想选择奠定了基础，然而二者最终成为凝质或是流质仍然有深层次原因。

三、认知一致性与认知失调理论：康有为对世界观一致性的追求

基于既得利益与维系既得利益的渴求，康有为具有了成为凝质的基础，为何基础的存在导致其最终成为凝质？在此，笔者引入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一致性理论与认知失调理论：“人们倾向于在心理上表征所认知的世界，竭力理解世界以使自己能够预测并且控制事物。大多时候，人们企图去消除不一致性，从而使自身理解世界的能力保持一致[[17]](#footnote-16)。”进一步可知，信念、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让世界看起来可以预知，这就使得人们通常会具有保持一致性的观念，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这也解释了前文提及的为何人们会倾向于珍视更为得之不易的事物——正是由于在获得过程中的不易性，人们以珍惜的态度取得这一事物，并且出于认知一致性的观念，保持着对于这一事物的珍惜态度。

具体到康有为而言，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已然通过革除旧学、游历香港、博取西方等途径形成了完整的来之不易的认知体系：君民共主，变器变道。这从康有为言其一生学识自三十岁起便不应再变，也不会再变也可见一斑。不应再变，折射着康有为对自身学识的自信；而不会再变，无法再变，却也体现出他对于自身来之不易的认知体系的珍视。这一体系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并且随之为康有为带来其人生既得利益的最大值。其后的流亡岁月里，康有为持有保持高度一致性的信念，从而实现了自身行为的合理化。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推知：既得利益与维系既得利益带来的心理动机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康有为凝质性的塑成。

四、刺激寻求理论：梁启超遵从内心的个人本能

回到梁启超的角度，救亡图存的心理需求仅仅为其奠定了成为流质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梁启超为何最终成为流质，没能像康有为一般坚持认知一致性，反而时常“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18]](#footnote-17)”？

笔者进一步引入动机理论中的刺激寻求理论加以阐释：“人们大部分时候会设法降低那些对自身产生影响的紧张或刺激。然而人类与其他动物会倾向于在长期一致性行为后寻求新异刺激。”在刺激寻求驱动的情况下，机体会寻求增加刺激。这样的刺激寻求无疑是进化上的优势，积极的、受驱动去探索并利用环境的动物更有可能在复杂的生存斗争中生存下来，并将自身的基因延续给后代。尽管如此，最初持有的态度仍然具有认知锚起作用。人们常常从新观点偏离已有认知的程度对其进行判定。接受较大的偏离就需要更多的信息加工——更多的智力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短时间内巨大的偏离——譬如政治思想从保守派转变为革命派——往往受到抑制。

从这一观点出发，人性中本就夹杂有寻求可接受程度的新异刺激（尝试新异观点）的本能。对于康有为而言，其心理需求决定了康有为对这一本能的高度抑制，然而梁启超的心理需求并不会对这一本能产生抑制。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会不断地探究新的政治思潮，通过不断微小地改变认知，在不同思潮的对比间进行取舍，逐步更新当前的政治思想。故而遵从内心的人类本能，梁启超的凝质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固。

五、社会与群体心理学：梁启超认知的最终塑成作用

既得利益需求与刺激寻求的个人本能并不产生矛盾，故而二者相互作用不断推进了梁启超流质性的形成。然而上述的分析大多是从个体心理学中的人本主义理论进行剖析，“人本主义将人和自我作为研究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对于个人的塑成作用[[19]](#footnote-18)。”如若个人没有强烈的价值倾向，很难仅仅因为个人因素就完成对于人格的塑造。因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在多元社会文化中，如果不参照社会文化基础，就难以对人格有全面认识[[20]](#footnote-19)。”我们无从认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初期便形成了坚定成为流质的个人倾向，故而对其最终人格塑成的剖析还应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进一步探究。

社会心理学研究心理与行为过程在家庭、集体乃至社会环境中的本质与原因。在家庭教育因素上，梁启超“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21]](#footnote-20)。”可以推知，由于原生家庭的缘故，梁启超自幼便有渴求救亡图存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在集体层面上，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作为人便要归属于一些社会集体。梁启超早期是维新派核心人物，维新派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介于革命与守旧之间的温和改革。维新本身便有一定的变革基础，这样的集体效应也使得梁启超早期在思想上有善于思变的倾向。最后，正如上述社会文化理论的前提，清末民初诚然有着多元的社会文化。在政治思想角度上，这体现为守旧思想、改良思想与革命思想等等的激烈碰撞，例如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士在1905年左右的大论战[[22]](#footnote-21)等等。尽管个体的独立性是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普遍呼声，但是从孩提时代起，人的思想必然不断被社会化。对于梁启超而言，梁启超本人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广州、汕头等地是较早的通商口岸，广东的社会环境更早受到西方思潮的冲洗，其思想较全国而言显得较为先进，存在广泛的社会改良风潮[[23]](#footnote-22)。容闳、郑观应、何启、胡礼垣、孙中山、康有为、洪秀全、詹天佑、邓世昌等人的出现无疑不是广东地区思想较为进步的明证。由此可见，广东当地的社会文化基础可能对梁启超流质性的形成也存在一定影响。并且，梁启超18岁入京参考会试，“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24]](#footnote-23)。”这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不仅是广东，中国其余地区都有了一定的改革主义底色。可以推知，改革主义在晚清有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基础。从而，在晚清本就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家庭、集体与社会的潜移默化作用与梁启超个人没有显著路径限制的心理需求夹杂着人类刺激寻求的本能，最终较大程度上塑成了梁启超多变的心理动机，转化为流质的人格特点。

六、结论

综前文所述，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分析康梁二人政治思想选择的差异，并以此探究二者流凝之别的心理学归因，得出结论：戊戌变法后，康有为的既得利益包括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两大方面，其恢复、保持与扩大自身既得利益的渴求加之认知一致性的心理效应一定程度上使其了产生恢复皇权、再度维新的心理需求，这一心理需求抑制刺激寻求的本能，转化为政治思想保持不变的动机，使其最终成为凝质。

而梁启超的既得利益主体上为社会地位，维系既得利益与刺激寻求的本能并不产生冲突，故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不断发生一定范围内的改变，保持着自身救亡图存的社会成就需求，最终形成消除封建君主专政国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心理需求，这一心理需求转化为政治思想改变的动机，最终使其成为流质。

参考文献

康广仁：《与何易一书》，张元济编著；《戊戌六君子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年，第65页。

史飞翔：《康有为梁启超的师生恩怨》，《钟山风雨》,2018年第2期，第27-30页。

黄跃红,王明德：《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求索》,2005年第8期，188-192页。

莱因贝格 F,《动机心理学》，王晚蕾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年，第14页。

梁启超：《三十自述》，崔志海编著；《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6-19页。

何一民, 隗瀛涛，《维新之梦——康有为传》，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35页。

郑全全，《社会心理学》，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376页。

郑全全，《社会心理学》，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456页。

何一民, 隗瀛涛，《维新之梦——康有为传》，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38页。

斯滕伯格 R J, 《认知心理学》，杨炳钧, 陈燕译：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年，第98页。

斯滕伯格 R J, 《认知心理学》，杨炳钧, 陈燕译：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年，第47页。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编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页。

荣格，储昭华，沈学君，《心理类型：个体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dividuation》，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年，第79页。

郑全全，《社会心理学》，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65页。

喻中：《共和萌生的思想镜像: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第206页。

孙洪柏：《试论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4期，第39页。

1. 康广仁：《与何易一书》，张元济编著；《戊戌六君子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年，第65页。 [↑](#footnote-ref-0)
2. 史飞翔：《康有为梁启超的师生恩怨》，《钟山风雨》,2018年第2期，第27-30页。 [↑](#footnote-ref-1)
3. 黄跃红,王明德：《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求索》,2005年第8期，188-192页。 [↑](#footnote-ref-2)
4. 黄跃红,王明德：《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求索》,2005年第8期，188页。 [↑](#footnote-ref-3)
5. 黄跃红,王明德：《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求索》,2005年第8期，189页。 [↑](#footnote-ref-4)
6. 莱因贝格 F,《动机心理学》，王晚蕾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年，第14页。 [↑](#footnote-ref-5)
7. 梁启超：《三十自述》，崔志海编著；《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9页。 [↑](#footnote-ref-6)
8. 梁启超：《三十自述》，崔志海编著；《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6页。 [↑](#footnote-ref-7)
9. 梁启超：《三十自述》，崔志海编著；《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7页。 [↑](#footnote-ref-8)
10. 何一民, 隗瀛涛，《维新之梦——康有为传》，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35页。 [↑](#footnote-ref-9)
11. 郑全全，《社会心理学》，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376页。 [↑](#footnote-ref-10)
12. 郑全全，《社会心理学》，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456页。 [↑](#footnote-ref-11)
13. 何一民, 隗瀛涛，《维新之梦——康有为传》，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38页。 [↑](#footnote-ref-12)
14. 史飞翔：《康有为梁启超的师生恩怨》，《钟山风雨》,2018年第2期，第28页。 [↑](#footnote-ref-13)
15. 梁启超：《三十自述》，崔志海编著；《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7页。 [↑](#footnote-ref-14)
16. 斯滕伯格 R J, 《认知心理学》，杨炳钧, 陈燕译：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年，第98页。 [↑](#footnote-ref-15)
17. 斯滕伯格 R J, 《认知心理学》，杨炳钧, 陈燕译：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年，第47页。 [↑](#footnote-ref-16)
18.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编著；《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页。 [↑](#footnote-ref-17)
19. 荣格，储昭华，沈学君，《心理类型：个体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dividuation》，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年，第79页。 [↑](#footnote-ref-18)
20. 郑全全，《社会心理学》，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65页。 [↑](#footnote-ref-19)
21. 梁启超：《三十自述》，崔志海编著；《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6页。 [↑](#footnote-ref-20)
22. 喻中：《共和萌生的思想镜像:梁启超走向共和的思想历程》，《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第206页。 [↑](#footnote-ref-21)
23. 孙洪柏：《试论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4期，第39页。 [↑](#footnote-ref-22)
24. 梁启超：《三十自述》，崔志海编著；《梁启超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6页。 [↑](#footnote-ref-23)